

重读《白鹿原》

许子东

内容提要 毛泽东关于乡村“政权”“族权”和“神权”的论说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阐释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在现当代文学中历来被怀疑被批判的“族权”（宗法祠堂），在《白鹿原》中成为正面形象。小说中的“神权”也不仅体现为庙宇迷信，而可能包括某种知识教育信仰系统。“政权”“族权”和“神权”三种权力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历史走向是《白鹿原》重新书写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历史的关键线索。

关键词 《白鹿原》；“政权”；“族权”；“神权”

《白鹿原》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1]，自 1993 年问世以来，持久受读者欢迎。陈忠实在作品前引用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写了六个历史时期：晚清时期、军阀混战时期、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镇反”时期。小说基本格局在前两个时期，即晚清和军阀混战时期已经成形。第一章到第五章写的是 1910 年之前，第六章到第十二章大概写 1911 年到 1927 年。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2]

通过这一论述，读者可以对《白鹿原》有更深入的理解。按照《白鹿原》的描写，晚清时期，至少在乡村的基层，“政权”的影响力比较有限。白嘉轩设计买卖鹿子霖宝地，中医冷医生做中介，签约即可，并没有官员批准。农民贪财种鸦片，县令说要禁，却也贯彻不了。白鹿两家换地打架，甚至要打官司，结果白鹿书院的朱先生写一幅字送给两边，

就讲和了。更重要的事件，比如说第五章，白嘉轩主持重修祠堂，在祠堂内办学，而且有谁如果犯了赌、毒等违反乡规的事情，也在祠堂里执法、体罚。这些事情关系到乡村基本社会秩序，没有看到有清廷的官员来参与。

乡村“政权”具体开始出现是在小说第七章。辛亥革命后，“皇帝在位时的行政机构齐茬儿废除了，县令改为县长；县下设仓，仓下设保障所，仓里的官员称总乡约，保障所的官员叫乡约。白鹿仓原是清廷设在白鹿原上的一个仓库，在镇子西边三里的旷野里，丰年储备粮食，灾年赈济百姓，只设一个仓正的官员，负责丰年征粮和灾年发放赈济，再不管任何事情”^[3]。现在白鹿仓变成了行政机构，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保障所更是新添的最低一级行政机构，辖管十个左右的大小村庄。

作家对地方行政概念交代得非常清楚。白鹿仓的总乡约是田福贤，第一保障所乡约是鹿子霖。小说里，田福贤上面的县长换了好多个，但是国民党县部书记从北伐到 1949 年都是岳维山。

从情节上讲，田福贤、岳维山这些乡县干部一做二三十年，既没有调走，也没有升官，其实不大可信。共产党员鹿兆鹏（鹿子霖长子），北伐时已是党的省委委员、县委领导，30 年代是红三十六军副政委了，可是十几年以后，到 1949 年，他还只是解放军十五师的联络科长，也是为了使小说情节凝练的需要而没怎么升迁。这些人物几十年围绕着白鹿原战斗，为了争夺“政权”。读者并不在

意这些细节破绽，因为小说的重点从来不是写岳维山、田福贤或鹿兆鹏的仕途，甚至关键也不在他们几十年的私人恩怨，小说的真正主题是“政权”“族权”与“神权”三者之间的关系。

《白鹿原》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这是一部试图从“族权”“政权”与“神权”的矛盾关系来解析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小说。“族权”和“政权”的矛盾统一关系，直接体现在白嘉轩、鹿子霖两个财主家三代人几十年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历史。《白鹿原》就剧情来讲，完全可以借用并扩展一下路翎小说的书名：“两个财主底儿女们”。

—

据说长篇小说第一句很重要，奠定基调。《白鹿原》第一句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4]这里的关键词既不是“七房女人”也不是“豪壮”，而是“后来”。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多年以后……”的写法。

陈忠实有一大堆乡土故事素材，但写法技巧受到1985年寻根文学及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白鹿原》是以《古船》笔法写出来的《红旗谱》。在思想上，这种当时出现的对中国乡村伦理秩序的再思考，和80年代海外新儒学理论的输入有没有有意无意的关系，也要仔细观察。

白嘉轩之前六个女人都在婚后不久死去。某天，白嘉轩在雪地偶然发现一处有奇物异草，姐夫朱先生把异草解释成当地传说中的一个神话吉祥物白鹿。于是，白嘉轩就通过冷医生做中介，和鹿子霖做买卖，获得了这块不起眼的宝地。自从把父亲的坟迁到宝地以后，白嘉轩果然诸事一帆风顺：先娶了最后一任妻子仙草，接连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又在岳父指点下种鸦片发财；然后主持祠堂重修，并办学堂。姐夫也称赞白嘉轩，说：“你们翻修祠堂是善事，可那仅仅是个小小的善事；你们兴办学堂才是大善事，无量功德的大善事。”^[5]这时“白嘉轩确切地验证了自己在白鹿村作为族长的权威和号召力，从此更加自信”^[6]。

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族长”“族权”的形象有一个从“可疑”到“可憎”的变化过程。《祝福》

里坚持礼教的鲁四老爷对祥林嫂的悲剧有没有责任？《萧萧》里的长辈因为少读《四书》《五经》，没有把通奸偷情的童养媳马上卖掉。在《家》里，高老太爷当然是旧秩序的基石。不过黄子平也讨论过，“高老太爷临终时与觉慧的对话是最动人的一幕”，真正败坏礼教传统的是克安、克定一班人^[7]。路翎笔下的财主蒋捷三，比儿女们更坚持人伦底线，也更富有抗日热情。但到了《红旗谱》，冯老兰兼有土地权、宗法祠堂，儿子又是国民党司令的同学，所以封建“族权”和反动“政权”狼狈为奸，族长的负面形象渐渐成为模式，甚至成为“集体记忆”。张艺谋将刘恒小说《伏羲伏羲》改编成电影《菊豆》，故事背景搬到了民国早年。要惩罚侄婶偷情，法庭就是阴森森的宗族祠堂。

《白鹿原》不仅不同于早年当代文学中的“族长—地主”联盟，而且比现代文学中任何一部作品都更加正面描写“族权”的代表白嘉轩。整个长篇中，“政权”属于国民党等，有点被神话的“族权”却始终能与“政权”有些分离甚至抗衡。

白鹿祠堂重修以后的第一件大事，是在祠堂里办学堂。那么学堂又属于哪一个权力系统？其实学堂和三个权力系统都有关系。现代学校当然可以由政府办，白鹿原里后来也有官办的新式学校。但第三个权力“神权”也可以被广义理解为信仰系统，不只是“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因为信仰也依托于道德和知识（哪怕是不够正确的道德和知识），所以小说中的学校教育又和“神权”有关。这也是为什么小说里一贯英明的朱先生特别称赞办学堂比修祠堂更重要。

《白鹿原》中各色人物称得上主角的也有十来个：白嘉轩、鹿子霖、鹿兆鹏、白灵、白孝文、黑娃、鹿三、田福贤、冷先生等。但其中思维最清醒，地位最独特，看透所有政治人伦关系，甚至能感悟阴阳世界问题，几乎最不犯错误的就是“神权”代表——白鹿书院的朱先生。

白嘉轩发现宝地，因为朱先生解图；方巡抚领清军进攻辛亥革命军，也被朱先生劝退；军阀刘军长围攻西安，亦是朱先生的预言导致他崩溃——至少是预言他崩溃；几十年变迁中，只有朱先生超

然，得到各方势力或明或暗或真或假的尊敬。类似的例子，整个长篇，整个白鹿原上的近现代史，都一再证实。

理智上，读者当然也会怀疑朱先生的形象到底是不是真实可信，是不是“魔幻现实主义”中的“魔幻”部分。但是国人既然能相信诸葛孔明，为什么就不能假想（或者至少盼望）孔明在20世纪中国故事里也有一个传人？在小说里，谁认识朱先生，谁就会在各种争斗中获得一定优势。因为朱先生的功能太重要，小说出版后还有人试图找出朱先生的原型。朱先生在《白鹿原》里兼有认识魔幻（迷信）和具备知识（信仰）的双重能力。前者比如说领悟白灵，感知生死，小说里其他人也有梦中显灵、鬼魂附体等描写。后者比如研究县制，纵观天下，使得国共双方、土匪军阀都十分信服。

既懂魔幻神奇，又通知识书本，朱先生在小说里的功能就是把学校教育与“神权”信仰系统挂钩。这很特别，因为在其他革命历史小说里，学校都是祠堂与迷信的对立面。小学老师常是地下党（如《红旗谱》的贾湘农），宣传革命新思潮，反对祠堂文化。《白鹿原》里虽然鹿兆鹏也是新学校的校长，但朱先生的白鹿书院，似乎更有学术气氛，客观上与原上的“政权”和“族权”分庭抗礼。

《白鹿原》要想象和虚构这么一个“政权”“族权”“神权”权力制衡的局面，还要加上一个辅助因素——三者之间要有专业人士沟通。在《白鹿原》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冷先生始终严守中立，负责文书、手续、契约、信用、担保，处理重大官司、人事纠纷、红白喜事，假如有公共卫生事故，当然更要请他出面。冷先生将两个女儿分别嫁给鹿家长子和白家二子，与白鹿原“政权”和“族权”的代表同时保持亲家关系。

在小说的第一个历史阶段——辛亥革命前，两个地主，一个医生，一个校长，互相之间又有子女婚姻关系相连，形成了一个人事人伦关系网，维持着白鹿原的“政权”“族权”“神权”的暂时平衡。

二

但是到此为止，小说好像回避淡化了一个农村

故事必须处理的重要矛盾。鹿三从秉德老汉当家时就在白家打工。主仆关系和谐，长工觉得找到好主人，地主也觉得找到好长工。白嘉轩和鹿三一起下地干活，家里事从不把鹿三当外人，白家独生女甚至认鹿三做干爹。《白鹿原》是否有意淡化阶级矛盾或者阶级斗争？

驯服长工鹿三有一个强悍造反的儿子黑娃。黑娃虽然和地主的儿子们一起在祠堂读书，但就是不安心。在白家打工，也讨厌主人家腰板太硬，形象太正。他反而和鹿兆鹏关系良好。阶级身份和对这种身份的挑战后来对黑娃的命运有决定性影响。

小说第六章是全书当中最有和平气息的一章，不仅因为出现了辛亥革命，不仅因为白灵认鹿三为干大——矛盾调和，也不仅因为朱先生奇迹般地劝退了清军方巡抚，还因为朱先生为白鹿祠堂拟了一份乡约。乡约不仅书写在祠堂墙上，所有族人还都要背诵：“一、德业相劝；二、过失相规；三、礼俗相交……”一时间小说中的民间治理秩序好像完全由“族权”掌控。

有两件事突然打破了祠堂里朗诵乡约的美好气氛。第一个事件是黑娃出外打工，带回来一个来历不明的风骚女人。小说第九章专门补述黑娃娶小娥的全过程。地主娶二奶为了“泡枣”。女人送餐递碗，手指触碰。半夜入房，小伙子初次性体验——《白鹿原》非常喜欢浓墨重彩地描述男人的初次性生活经验，后面还有白孝文新婚、白家三儿子娶媳妇等，都是强调男性生理角度。事情暴露，一番曲折，黑娃把小娥带回白鹿原。陈忠实的性描写不像王小波那么有间离效果，也不像贾平凹那样细密写实，主要特点就是强调处男感觉，反复强调。

写农民与地主小老婆的故事，是当代小说里的老桥段（与之相对，也有小说常写地主看中农民女儿）。但族长不准黑娃小娥上祠堂，他们只能住在村外破窑。另一边厢地主儿子鹿兆鹏娶妻，比黑娃更加不幸。新婚次日就不与妻子同房，说是没有爱情。父亲、祖父到学校劝，鹿校长还是不肯回家见妻子。男人在新婚之夜就逃走的情节，似曾相识，《活动变人形》和《玫瑰门》都有。

并不是《白鹿原》里所有年轻人的婚事都在

呼应其他小说，白孝文就是特例。他被父亲培养成一个极正经的男人，以至于初夜懵懂无知，后来是在别人的共同教导下终于开窍。但一旦开窍，势不可挡。父亲、祖母只好警告新媳妇，赶快多照顾你老公的身体，身体要保重。“族权”下的家庭，充满关心，也充满管控，但再怎么关心和管控，《白鹿原》里财主的儿女们都会走跟父母不一样的道路。

第二个事件是暂时平衡的局面被一帮外来兵痞打破。军阀刘军长围攻西安城，派杨排长带几十个士兵到白鹿原强行征粮。他们把老百姓找来，进行射鸡（击）表演——将一排鸡吊在那里，一排士兵举枪打去，打得血肉横飞，一地鸡毛。田福贤、鹿子霖等乡官没法违抗，村民只好乖乖交粮。唯一的反抗行动，就是地下党鹿兆鹏找黑娃、韩裁缝帮忙，三人烧了军阀征粮的米仓。下面军阀杨排长虽然胡作非为，但是上面刘军长却很敬重白鹿书院朱先生。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美梦：不管什么样的政治势力都要尊重一个中立的文人。刘军长请朱先生算命，预测战局发展。朱先生婉转动走了军阀。拖了几个月，军阀果真放弃围城。白鹿原渡过了一个难关。

军阀混战快结束之时，就是北伐胜利进军之际。小说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细节来渲染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历史气氛：白家白灵和鹿家兆海在保卫西安时结下友谊，两人讨论前途，结果决定一人入一党，反正都齐心北伐。少男少女掷铜元，白灵参加国民党，鹿兆海入了共产党。两人抱在一起，又以铜元起誓，友谊变成爱情——这是现当代中国小说里最富戏剧性的一个瞬间。

在当代文学史上，《白鹿原》的第一个贡献，就是讨论“族权”有没有可能在乡村秩序下与“政权”“神权”互相制约。其实也是探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是否存在某种独特的政教分离模式。

小说的第二个贡献，是在茅盾之后，再次以比较写实的方式展现北伐时期的农民运动。鹿兆鹏介绍黑娃去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历经数月的学习，回来以后就在各村组织农会，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协”。小说中的农民运动做了几件大事：一是先惩罚好色之徒，把和尚和碗客捆绑在戏台上，揭露他

们的性罪行，群情激奋。与“性”有关的审判总是最引人注目。二是算经济账。批斗总乡约，让田福贤秘书招供账面上、台底下贪污了多少钱，这可是大家的血汗钱……于是民情再度激愤。但是鹿兆鹏校长掌握政策，没有马上动用铡刀。三是算文化账，砸碎祠堂当中的那些碑石乡约，打破精神枷锁。当然，祠堂里的学堂也顺带被冲击，不能让封建主义毒害乡村子弟。

三

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田福贤回乡，在同一个戏台惩罚农协，吊打农民运动参加者，黑娃逃走了。这时，之前沉默的族长白嘉轩出面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修复祠堂，重拼乡约。朱先生称赞说这才是治本之策，言下之意：其他方式都是治标。祠堂重开的仪式由族长儿子白孝文主持——暗示这个时代的“族权”也可以世袭。第二件是白嘉轩当众跪求田福贤不要反攻倒算。也算是卖族长的面子，放过一些农民运动参加者。不过白兴儿、小娥还是被惩罚。到此，小说中非常正气英武的“族权”已经受到三次挑战：军阀射鸡表演，农会怒砸祠堂，族长跪求乡官。祠堂威信的建立和被损坏、再建立和再毁坏，是《白鹿原》一条非常重要的情节主线。

黑娃逃走后，先随革命军，后做土匪。小娥在村里受迫害就求乡约长辈鹿子霖保护。不想鹿乡约连哄带骗地占有了小娥。鹿子霖占有小娥不只是因为好色，他还要女人去色诱白家长子。白孝文眼看要成为族长接班人，鹿乡约想要打击白家和祠堂。

鹿乡约这段“政权”暗算“族权”的情节比较煽情，充满巧合，匪夷所思。但从长篇布局看，的确推动了叙事节奏，达到了令祠堂正义蒙羞受挫的叙事效果。鹿子霖和小娥的奸情被人发现，乡约又转祸于狗蛋。在祠堂上，白孝文和鹿子霖亲手鞭打奸夫淫妇。晚上鹿子霖搂着裸体的小娥说，鞭打在你身上，其实白嘉轩就是在打我的脸。

之后小娥果然色诱白孝文。但白孝文不像鹿子霖，他真的有点喜欢田小娥。田小娥到此为止，先后和郭举人、农民黑娃、鹿乡约、白孝文四个男

人发生关系，在地主、土匪、乡官、族长接班人与人之间，她的身体就成了各派势力的竞技场。田小娥的身体先是凝聚着地主和雇农的阶级矛盾，然后又变成土匪和官员的斗争战场，接着又要成为小说中“政权”暗算“族权”的阴险工具。

而且，好戏还没完。白嘉轩坚守的祠堂文化已经接连被军阀、农会和总乡约破坏，但接下来的两个打击更加强烈。一是黑娃派土匪夜袭白、鹿两家，打死了鹿子霖的爹，重伤了白嘉轩的腰。黑娃小时候就嫌他的腰板太硬了。二是孝文小娥事发，两个人在祠堂当众被鞭刑，培养已久的“族权”接班人毁于一旦。

白孝文卖地、卖楼、抽鸦片，很快就堕落成乞丐。在绝境时，他跟很多灾民一起去讨舍饭，因鹿子霖、田福贤介绍他到保安团当兵，绝处逢生。白孝文的前半生，就是在祠堂失败，然后投靠官府，最后成为小说中的实际胜利者。他的命运，是否也意味着整本《白鹿原》，写的就是“族权”对“政权”的不断妥协、抗争与失败的历史呢？

另一边厢，鹿兆海做了军官，入了国民党，回来碰到白灵，白灵却在大革命失败时参加了共产党。两个人位置换了，谈不拢了。比较吊诡的是白灵在地下工作当中居然要扮演鹿兆鹏太太。两兄弟爱同一女子，还要夹在政治斗争、谍战背景当中，更加残酷。

四

《白鹿原》1998年在争议声中获茅盾文学奖。《白鹿原》在男女关系这一方面的描写，其实远远没有超过茅盾的自然主义。小说从第十四章到第二十八章，都写二三十年代的国共故事，抗日八年只有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到第三十四章又是解放战争时期。所以国共在政治军事上的争斗是《白鹿原》最主要的政治背景。

祠堂族长白嘉轩开始对农会和乡官都不支持，象征知识信仰系统的朱先生对政治前途有更长远的忧虑。小说十九章写鹿兆鹏被捕，岳父冷先生拿出全部家当贿赂总乡约田福贤，鹿子霖也在一旁求情。田福贤把所有送来的钱都埋在一棵树下，然后

向上级要求把共产党员鹿兆鹏押回白鹿原处理。结果他另外找了个罪犯顶替，放走了鹿兆鹏——被放走的鹿兆鹏想不通，问朱先生：田福贤怎么会放过我？朱先生劝这位地下党人赶快离开西安，不然救你的人全不得活。田福贤之所以承担风险放人，一方面是贪财，另一方面也是人情——冷先生的面子，还有鹿子霖是同党。

鹿乡约、田福贤、岳维山代表“政权”，白嘉轩、白孝文、白孝武修补“族权”，小说中只有一个朱先生在维系象征信仰系统的“神权”吗？其实朱先生的信仰工程得到两个女主角无意之中的帮助。一是象征白鹿的白灵。白灵之死，几个主要人物都有梦中感应，这是现实主义中的理想之光。二是田小娥后来被愤怒的鹿三杀掉，鹿三就被鬼附体，生不如死，这也是魔幻之笔。正值白鹿原瘟疫，白嘉轩的老婆仙草、母亲白赵氏都为鬼影所扰。于是村民们纷纷去拜被埋掉的窑洞。最后朱先生建议给小娥的亡灵建一个塔，给她压住——其实是化怪力乱神为信仰图腾——再一次证明了小说中的“神权”既是“土地庙和灶王爷”，又不只是“土地庙和灶王爷”。之前人人唾骂的小娥，现在化蝶让大家跪拜，“神权”作为朴素的乡村宗教，由迷信、知识和信仰共同组合而成。

“十七年文学”描写国共故事，主要是四种故事模式：一、农民运动；二、白区谍战；三、武装斗争；四、改造土匪。《白鹿原》一定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这四个模式。对农民运动，有多方面描写；写白区谍战，有真假夫妻；写武装斗争和土匪改造，都是旧情节新结尾。战场戏是红三十六军进攻西安，可惜因叛徒出卖而战败。改造土匪，就是鹿兆鹏上山找黑娃及匪首。土匪先投县保安团，后在白孝文、黑娃带领下起义。

从《红高粱》起，土匪在革命战争文学里扮演重要角色，深层原因是侠义传统在民间有深厚基础。《白鹿原》里黑娃既代表底层农民造反，又带领农会砸祠堂，再作为土匪游离于国共之间。白孝文和黑娃都是“先造反后招安”，回乡拜祠堂。“浪子回头”一方面显示直到40年代，“族权”在“政权”争夺与“神权”动摇之时，至少在形式上仍维持自己的道德尊严，另一方面也证明乡约族

长腰板终究要和世俗权力妥协。假如孝文、黑娃不是骑马的军官，他们还能重回祠堂吗？

当代文学中，《红旗谱》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模式影响深远。贫农—教师—共产党，对抗地主—祠堂—国民党，这个斗争格局，被很多作品继承与发展。《红高粱》加上了第七个因素——土匪，故事结构有所改变。《白鹿原》是更大规模地调整重组：还是六个因素，但是学堂和祠堂站在一起，并和政治斗争形成三角关系。土匪只是三角状态之外的一个游离的、次要的因素。

小说不仅论述了“政权”“族权”“神权”三者角逐的历史走向，也涉及了“族权”“神权”后来逐渐败退的部分原因。不管怎样，到了90年代，有作家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有了一些世纪末角度的回顾。陈忠实基本上就写了这一部小说，但已经够了。20世纪中国小说史永远都不会遗漏他的名字。《白鹿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高峰。

从晚清到“五四”文学到延安文学再到当代文学，农民、知识分子和官员/干部形象一直贯穿在大部分中国小说里，而且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很多变化。最基本的关系模式是知识分子或愤慨或无奈或冷漠地看着官府如何欺负民众。愤慨如《老残游记》中江湖医生目睹并抗议官员（包括清官）胡乱判案伤害民众；无奈如《祝福》中的“我”眼见祥林嫂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束缚至死而无力援救于是自责歉疚；冷漠如《阿Q正传》中的阿Q最后被审判时，旁边有穿长衫的人虽然批评阿Q下跪是“奴隶性”，事实上他们也是审判阿Q的有文化的帮凶……到了《红旗谱》时代，更简洁的关系模式是“士助民反官”：小学教师地下党帮助贫苦农民与地主及反动政府斗争……直到80年代余华的《活着》，福贵一家在厄运、环境和官员（县长夫人等）压迫下八死一生，很苦很善良，但也还有一个文青视角来转述老农民（其实也是地主儿子）的故事。

在《白鹿原》中，当然也贯穿有“士—民—官”三种人物形象，但具体到个人，却又常常超越典型的阶级共性（作品引来非议获得激赏皆因

此）。比如白嘉轩，在祠堂教训体罚族人时他是白鹿原的“统治阶级”，抗议或哀求军阀和国民党官员时他又代表了乡亲民众。黑娃和他大鹿三都是农民，一个忠于主人保卫礼教（还杀害不幸的田小娥），一个打坏主人腰骨，上山为匪，最后起义。谁才能真正代表农民形象？中国革命里的阶级问题，在《白鹿原》中显得特别复杂。小说里的“士”又至少可分成三类：一是小学校长鹿兆鹏及白灵等年轻人，由进步学生成为革命党（由“士”而“仕”，新的官员/干部其实大都是从知识分子发展而来）；二是以冷先生为代表的“专业人士”，不问政治只办文书债务法律，是农村里的“工具理性”；三是最重要的“神权”代表，就是朱先生和他的学堂，始终站在“政权”与“族权”之外，始终旁观各种政治斗争。所以《白鹿原》的基本模式也还是“士见官欺民”，不过是“士”不只一类，“官”又有几种，“民”也不是一个整体概念。如何用“文学是人学”的原则来书写复杂的历史，《白鹿原》做了颇有文学史意义的尝试。

[1] 民间已有所谓“当代四大名著”一说，包括《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活着》《废都》四部小说。参见“天地史话”公众号《当代四大名著》，2020年11月30日，<http://www.360doc.cn/mip/948728400.html>，2021年6月27日。如果从明代“四大奇书”的传统看，《白鹿原》确是逐鹿中原的历史演义；表现农民和政府关系的有《平凡的世界》或《红高粱》或《活着》；世俗世情小说可以《废都》或《长恨歌》为代表；神魔科幻类只有《三体》传承。当然，在现阶段，这些说法都还缺乏严格的学术意义或民意统计基础。

[2]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4][5][6] 陈忠实：《白鹿原》，第87页，第1页，第60页，第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7] 黄子平：《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巴金小说全集》第4卷，第1—9页，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罗雅琳